《清代名人传略》简述

张广学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美国出版的一部我国清代历史专著。三十年代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发起编纂此书，邀集东西方五十名学者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极为丰富的藏书，自1934年至1942年历时九年始克于成。1943年由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出版。本书主编恒慕义（A.W.Hummel，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之父）二十年代曾在我国山西汾阳县任铭义中学（教会学校）校长，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与中美文化交流早有贡献。

这部词典式的历史专著实际上乃是一部传记体裁的清朝断代史。它通过八百零八篇人物传记把上起明末下迄清亡这三百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等等方面提纲挈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本书作序的胡适称赞："此书是一部完备的大传记词典。但是，《清代名人传略》绝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词典。它是今天（指四十年代初）可以看到的一部最翔实最好的近三百年中国史。"

本书为了讲清楚明清两个对立政权力量消长的原因和过程，也把一批明朝的当权人物、军事统帅以及对后来的清朝有某种影响的人包括进来。把一批明朝人写进清朝的人物传记，不免有断限不清之嫌，但本书撰写的某些明朝人传记却颇具特色。通过这些人物传略，读者可对明朝内部的各种矛盾加深理解，诸如宫廷内争、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争，边帅与廷臣之争以及宦官专政与"挺击"、"移宫"、"红丸"三案。自明朝万历皇帝大肆搜刮以来，农村日益贫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明廷内要剿"寇"，外要御"虏"，只好加征名目繁多的饷，饷的负担自然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结果，农民愈益无法为生，奋起反抗的人越来越多。明朝终于灭亡。

著者在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传中从我国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沿革一直写到建州女真的成长壮大并且详述八旗制度的由来和八旗组织的特点，从而使读者不仅对努尔哈赤本人的生平事绩也对后金的崛起有个完整的概念。

本书对人物的选择与评价，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具有特色，有一定的见解。下面举一些例子：

朱由校（明熹宗天启皇帝）在位期间（1620—1627年）朝政一委宦官魏忠贤，国事日非，边政大坏。沈阳、辽阳相继陷于后金（1621年），辽东尽失，努尔哈赤的兵锋直抵山海关外宁远城下。他这个误国昏君的形象早已为人熟知。但著者却以客观的笔法写了他。此人是个极有天赋并勤于所好的巧匠，能制做精美的家俱。他用木料仿制的宫殿小巧玲珑维肖维妙。他本非当皇帝的材料，对军国大事毫无兴趣。是传统的封建制度把这个生在深宫长于妇人太监之手的少年朱由校推上了皇帝宝座，这是历史的误会，一如北宋的赵佶、南唐的李煜那样。

1644年3月16日李自成部攻陷太原时死去的毕拱辰，《明史》把他附在蔡懋德（与毕同

时死去的山西巡抚）传中仅仅用了四十一个字叙述他的生平。本书著者却恢复了这位才华出众具有科学头脑、勇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的本来面目。1634年他受召抵京任户部主事之后即与传教士汤若望结识，并向他多方请教西洋有关人体结构知识。不久即将传教士邓玉函草译的一部西洋医书初稿《人身说》改译成通畅的中文著作。1635年以《泰西人身说概》（二卷）之名刊行，它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讲西洋医学理论的中文成书。这版成书现在只存留下一部藏于意大利罗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另有少数几部抄本藏于国内或欧洲的几家图书馆。此书，以及毕与此书的关系三百年来一直被忽略。只有俞正燮在1815年所写的一篇《人身图说》对此作了叙述。《裴录答案》（Answers To Questions on Natural Philosophy）是毕氏的另一部同类之作，此书原由传教士高一志草译，经毕氏改译而成。1636年付梓。书名"裴录"二字是Philosophy一词前两个音节"Philo"的对音。毕氏在序言中则把"Philosophy"一词直译成"裴录所费亚"。

陆陇其是有清一代很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吏。生前虽然屡遭贬谪，死后却备受荣崇。雍正二年命从祀孔庙，乾隆元年特谥"清献"，追赠官衔。这在清代是特例。但本书著者却首先写出他1675年京候职期间与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南怀仁之间的交往。他曾在这两位神父处见到过西洋钟表和一架天文仪器，并接受过他们的赠书。著者特地从陆的日记中摘出这样一句话：除"亚当、夏娃及耶稣降生之说"外，西洋之学皆可信。由此可见，陆陇其不仅是一位正直爱民的清官，而且思想开明颇能接受新思想。《清史稿》的作者却见不及此。

明清之际的朱之瑜（舜水）曾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见之于中外史册，本书为之立传。但是，当时还有一位类似的人物却从未见于中国记载，此人就是陈元赟。陈氏传略是著者根据日本史料写成的。陈元赟，杭州人，明末曾两度赴日，1638年再次东渡后即长留该国，1691年死于日本，葬在名古屋。他最受日人称道的事是他把中国的擒拿术传给了日本人，因此，日本一度把他说成是日本柔术的创始人。此说后来虽未确立，但学者们却一致肯定：他给日本柔术注入了新血液，对柔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他还把袁宏道的诗传到日本，并与日本人有唱和之作。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日本有他的记载，中国更应当有他的记载。

清帝康熙、乾隆祖孙二人都极为推崇明代最享有盛名的书法家董其昌，临摹他的字体。封建社会上行下效，上好下甚。乾隆朝的廷臣竞相学写董字，一时风气终于形成清代的标准字体——馆阁体，临场应试者必须用此体书写答卷，否则不予录取。1705年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时亲命为董祠立匾，并赏赐董氏后人官职。因此，本书也为董氏立传。

1607年初（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喀尔喀蒙古派恩格德尔出使建州女真，授予努尔哈赤"昆都仑汗"称号，这个词的蒙文原意是"彬彬有礼的汗"。努尔哈赤起事以来，为全力统一女真各部一向对蒙古采取谦让笼络的策略以期博得蒙古人的好感，所以蒙古人才以此号相赠。后来清朝的官方记载《实录》却篡改原意，竟然把这个称号译成"神武皇帝"（这比努尔哈赤自己称帝还早了十年）以神化努尔哈赤。《恩格德尔传》的著者戳穿了这桩伪造的史话。

"三藩之乱"的首倡者吴三桂1674年春进占湖南之后曾一度逗留不进，并致书康熙。康熙见后勃然大怒，立即下谕处死其子吴应熊。吴在疏中究竟说了什么话，致使康熙震怒，清代官方记载一向讳莫如深。只《逆臣传》卷一、十四页载有："上谕部臣曰：览吴三桂奏章乖戾词语，妄行乞请"。究竟什么乖戾词语，这里也没有交待。本书在吴三桂传中却透露了

原话大意："吴声言要恢复明室，如果他（指康熙皇帝）同意率领满人退回满洲，甚至把全朝鲜也许给他"。

康熙皇帝在世时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一向很敬重，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念及传教士"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按指张诚、徐日升居间协助签订尼布楚条约之事），劳绩甚多"，乃应索额图之请于1692年3月22日（康熙卅一年二月初五）特下谕旨（即西方传教士津津乐道的宽容谕旨），准基督教在各地传教。雍正初年基督教却突遭禁止，其故安在？《清史稿》未加解释。读者可在苏努（《清史稿》此人无传，只在卷一六二，表二及卷二一六，八九七〇页两处略有提及）传略中找到答案。

图理琛于1712年奉康熙皇帝之命绕道西伯利亚间关万里出使里海之滨的土尔扈特部，往返历时二年零十个月。康熙对此行深表满意。图理琛所撰此行纪实《异域录》于1723年刊行，三年之后（1726）即被译成法文，在欧洲广为流传。此后陆续被译成俄文、英文。这样一件大事却不见载于《康熙实录》，何故？胤禛嗣位之后为何大肆删改《康熙实录》？读者可在胤禛、图理琛、延信、年羹尧各传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广泛运用西方史料，从而补正了我国原有史料的不足之处。从十七世纪早期的天主教徒，到参加过1839—1842年间鸦片战争及战后谈判的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及镇压起义的人，以及代表清廷办外交洋务的人，他们都和西方人打过交道，与他们接触过的西方人大都留有记载。读者可以从这些有关人物传略中看到许多引人入胜的西方记载。

这里只举一个事例。出身满洲显贵世家的马齐是康、雍之际的重臣。康熙年间虽曾一度因拥立皇八子胤禩为太子而遭罢斥，但不久即受命主管俄罗斯事务，后复任大学士多年，雍正即位官如故，并受褒"忠诚"。临死前清高宗乾隆皇帝说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关于这位"忠诚"的马齐，本书著者在参与恰克图条约谈判的图理琛传略中有如下一段的描述："据俄国记载，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签订恰克图条约的俄国使臣）之所以能与清方订立此项条约，其部分原因归之于他与当时主管中俄交涉的大学士马齐的友谊……我们得知，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曾向马齐许下送礼两千卢布的诺言，但在条约签订之后因现金短缺只付给他此数的一半。"

本书对清代汉学极为重视，凡有成就的汉学家几乎全部收入，对顾炎武、颜元、戴震、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都有长篇评述，篇幅之大超过彪炳史册的帝王将相。著者在介绍这些学者的同时还透露了他们的某些未刊手稿或某些著作珍本流往国外藏在外国图书馆的一些情况。例如，顾炎武的《菰中随笔》手稿从来刊刻，一度为陆心源（1834—1894年）所有，现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顾氏的诗集《蒋山佣残稿》三卷现藏于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黄道周的两部禁书《博物典汇》二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刻初刊本一部；《广名将谱》二十卷则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周亮工（1612—1672）选编的《赖古堂文选》二十卷刊于1667年，此书极为罕见，因其中收有钱谦益、艾南英人等的被禁之作，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

本书出版于四十年前，当时正是战争年代，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时代和条件的局限性使它不可避免地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例如曹寅传略，著者认为曹寅的长女（即曹雪芹的姑母）很可能是平郡王福彭的福晋，但当代学术成就已经确定，曹寅长女奉康熙御旨嫁与平郡王纳尔苏，福彭乃其所生。又如：在张尔岐传略中，著者介绍张尔岐的哲学思想时亦有未尽妥贴之处。在其它传略中亦有疏漏错误之处。

此书尽管不无缺陷，但截至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部西方研究我国清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它

问世以来的四十年间在西方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经常被历史学家引用，是西方学者们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鉴于目前清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并考虑到此书的学术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已与青海人民出版社商妥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组译工作已经进行。

学术动态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已全部编辑完稿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康熙起居注》之后，又一次编印而贡献给清史研究界的大型基本史料书，其责任编辑是该馆副研究馆员朱金甫同志。此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的重点项目，在编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的部分资助。全书共汇编了康熙时代一百三十七人的奏摺文书。共三千一百一十九件。其中不仅包括当时的名臣李光地、王掞、马齐、张玉书、高士奇、王鸿绪、张伯行、宋荦、蔡升元、孙柱、施世纶、徐元正、赖都、穆和伦、年羹尧、白潢、范时崇、杨琳、赵弘灿、赵弘燮、赵申乔、赫寿、郎廷极等人及康熙帝的内府亲信曹寅、李煦、孙文成等人的奏摺，也有不少提镇武员及系后补知县朱尔介、茶菴僧人实诚、天宁寺和尚广明等微末小民的奏摺。内容十分丰富，约有三百万字，分十册影印精装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截至去年十二月底为止，已全部编辑定稿，由档案出版社发厂制版付印。其中第一册早在去秋即已印毕，本拟在去年十月发行，后因装订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延至今年一月始与广大读者见面。其第二册正在印刷中。其第三册至第十册，刻下档案出版社已与印厂商定，将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全部印行完毕。

朱批奏折是清代最重要的机密奏报文书，其内更有皇帝的朱笔批示，内容涉及有清一代自康熙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尤其是在康熙三十年代以后，奏摺演变为密折制度，其中的不少奏摺，实际上是康熙帝的亲信奴才向他密奏所在地方民情及官场隐私的告密文书。而康熙帝在其中的朱批，也往往有一些是属于难以公诸于众的"私房话"，反映了他对某些人和事的真实看法和想法。因此，本书中的许多奏报和批示内容，是为《清实录》等官私史籍所未载，其中史料价值之高可以想见。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史料的来源有二：其一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熙时期朱批奏折原件，共约一千余件；其二是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康熙时朱批奏折，约二千余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件，过去未系统公布过；台湾故宫所藏之件，已在《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案康熙朝朱批奏折》中影印公布。此次即是转载于该书。因此可以说，现今可以找见的存世的全部康熙时期的汉文朱批奏摺，除有数百件千篇一律、别无其他内容的单纯的请安摺以外，基本上已搜集编入《康熙朝汉文批奏折汇编》一书之中了，它是一部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康熙朝的奏摺文献。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收藏有四千余件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待译出汉文后，亦将陆续影印公布。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一书印数很少，据闻档案出版社所印之数，现已被预订一空，只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备日后急需，才存有极少几部。国内外有关单位或个人，如确因研究和工作需要而欲购买此书，可及早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函商洽购。

（荆　蒲）